

生育支持组合对育龄人群 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

——基于线上调查实验数据的发现

陈 滔 胡安宁

【摘 要】全面认识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是现阶段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前提。文章基于调查实验数据,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了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单一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照料支持均正向影响二孩生育态度,但从组合效应来看,不同支持措施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协同效应。较高的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相结合能够产生正向协同效应,强化对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作用;但延长产假与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相结合均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弱化相应支持措施对女性、高学历群体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影响。此外,与机构照料相比,由配偶或父辈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对女性二孩生育态度的正向影响更大。基于此,文章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综合考量不同支持措施的组合协同效应的性质,同时重视家庭在生育支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育支持 政策组合 协同效应 调查实验

【作 者】陈 滔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胡安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一、引 言

近年来,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2025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社会团结的文化基础研究”(22VRC140)的阶段性成果。

育服务供给”，为新时期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明确了方向。

生育支持体系由多种激励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服务和政策组合而成(Luci-Greulich 等, 2013; 于萌, 2023), 其中包括各种旨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措施。常见的生育支持政策有完善生育休假和补贴制度、提升生育相关的医疗服务水平、推动建设普惠性育幼服务体系和生育友好型职场文化等。从国际经验来看, 在低生育率阶段, 各国政府对生育的激励一般会采取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的方式(Billingsley 等, 2014; 张洋、李灵春, 2023)。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 生育支持体系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各支持措施的独立效应, 也在相当程度上受不同支持措施之间协同效应的影响(Guetto 等, 2025)。

为系统理解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 本文利用自主设计的多因素调查实验, 分析了不同生育支持政策与服务组合的虚拟情境下育龄人群对生育二孩态度的差异。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其一, 利用虚拟情境实验设计, 初步探讨了生育支持政策与服务组合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 为既有国际经验发现(茅倬彦等, 2021; 王玥等, 2023)补充了基于中国社会实验情境的发现。其二, 通过设置虚拟情境, 评估了不同生育支持政策与服务措施的协同效应的性质, 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经验参考, 有助于提高政策相关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其三, 通过识别育龄群体对生育支持措施的期待与需求, 为生育支持研究补充了需求侧的信息, 有助于降低社会期望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提高生育支持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效率。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世界范围内, 较早完成生育转变的发达国家较早开始探索和实施生育支持措施。这些国家的政策探索与实践, 为现阶段中国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近年来, 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 其中包括旨在平衡子女照料与女性工作的育儿照料支持政策、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等; 此外, 一些地区开始对多孩生育直接发放育儿补贴, 不少地区在产假、育儿假制度以及教育、住房、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实施支持措施, 以降低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经济压力。

(一) 生育支持类型及其影响

广义的生育支持包括政府、社会及家庭等向生育主体提供的各类资源、服务及其他支持。从资源与服务的类型来看, 生育支持通常被划分为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照料支持 3 类(Thévenon, 2011; 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 2023)。其中, 经济支持旨在缓解育龄夫妇生育、养育子女带来的经济压力, 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直接的现金补贴、间接的税收减免等, 是低生育率国家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Gauthier, 2007; Ortiz, 2015); 时间支持

是为生育主体提供生育、养育的假期(包括产假、育儿假等)支持,以减少生育、养育与就业的直接冲突;照料支持指政府、企业、机构和家庭为生育主体提供替代性照护服务,以调和其子女照料与工作之间的张力。除上述划分方式外,也有研究从社会性别分工视角切入,根据生育支持措施是否会强化女性及其家庭的亲职照料责任,将其分为“家庭化”“去家庭化”“再家庭化”3类(Billingsley等,2014;朱荟、陆杰华,2021),或“单薪型支持”与“双薪型支持”两种模式(杨菊华,2019)。相较而言,资源供给视角的生育支持类型划分在操作实践中更为简洁,便于受访者理解,因而在已有研究中更为常见。本文在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中,采用资源供给视角的分类方式。

由于社会文化、人口结构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重要的国别差异,不同国家生育支持措施的实际内容往往不同,其实践效果也存在差异(张洋、李灵春,2023)。既有关于经济支持型政策效应的研究指出,经济支持可能在短期内提升生育水平(Bergsvik等,2021;Hart等,2024)。受生育成本日益上升的影响(庄亚儿等,2021),育儿津贴、税收减免等经济支持预期会提升家庭生育、养育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短期生育率。不过,关于经济支持对生育率的长期影响(即对终生生育水平的影响),目前还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Gauthier等,2025)。

关于时间支持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现有研究也未达成一致结论。有研究发现,生育假能够为职业女性提供生育和抚幼的时间支持,保障其产后重返职场的权利,因而对多孩生育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Duvander等,2019);也有研究指出,延长产假可能损害女性的就业权益,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石智雷、王璋,2024)。Thomas等(2022)在系统梳理欧洲及北美国家的生育假政策效应后指出,生育假与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正向相关、负向相关或零相关,具体性质因社会情境和研究背景而异。

类似地,既有关于照料支持的研究发现也存在争议。有研究指出,照料支持能够有效减轻年轻夫妻(尤其是女性)的照料负担,提升其生育意愿(朱荟、陆杰华,2021)。不过,照料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受社会性别平等化进程的调节,在性别平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照料支持能够有效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从而强化政策的激励效应(张洋、李灵春,2023)。社会化的照料支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其服务质量和安全性。例如,托育机构的安全及卫生隐患,可能引发微观家庭对托育服务机构的不信任(高琛卓等,2020),进而阻碍其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已有针对南欧和东亚部分国家的研究发现,公共照料支持对生育率的积极作用很小(Bergsvik等,2021;Hart等,2024);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指出,家庭成员(比如父母、配偶)的照料支持更有利于推动女性实现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转化,因而是对公共照料支持的重要补充(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

(二) 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

在多措并举的政策情境下,各类生育支持措施共同影响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

行为;不同支持措施之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协同效应不可忽视(Guetto等,2025)。从资源供给的视角来看,不同支持措施带来的资源累积可能对生育意愿或行为产生叠加效应。例如,朱荟和陆杰华(2021)基于OECD国家的经验分析发现,带薪生育假和托幼服务之间存在正向协同作用,二者分别缓解了女性在生产期和育儿期的现实困境,共同促进了家庭的再生育决策。然而,从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来推断(Dittmer,2005),当生育支持体系同时提供多种资源时,每种资源的边际影响可能会减小。综合来看,在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内部,不同措施之间既可能产生正向协同效应,也可能产生负向协同效应。

针对中国生育支持措施组合,目前有少数研究评估了三孩政策调整前不同生育支持措施的影响。例如,黄乾和范子昂(2023)利用2013和2017年的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发现生育假、生育补贴等措施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石智雷和王璋(2024)利用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发现延长产假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供给、增加其失业风险,但依然能够有效提升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由于政策情境可能影响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效果(张洋等,2024),因而,在三孩政策实施以来,日益丰富的生育支持措施组合的实际效果仍需要实证评估和检验。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於嘉等(2023)利用三孩政策实施初期收集的CGSS2021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资源和市场化照料服务是二孩生育潜力的重要解释变量;王卓和李梦鹤(2024)利用2021年成都专项调查资料,发现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社会情境下生育支持措施组合效应的实证检验还相对较少。一些中国学者对先发低生育率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应进行了梳理总结(张洋等,2024),归纳了西方社会情境下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组合(茅倬彦等,2021;王玥等,2023);但这些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研究结论在当前中国社会是否适用还有待检验。考虑到生育支持政策往往伴随着较高的财政投入,厘清生育支持措施组合的潜在效应及其协同效应的性质,对于优化财政投入、推动生育支持体系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基于此,本文利用多因素调查实验收集的数据,探究生育支持措施及其组合对当前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助于识别能够有效释放生育潜力的支持措施组合,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经验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复旦—耶鲁文化社会学中心于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1月31日实施的“当代居民文化价值观念调查”(Contemporary Cultural Values Survey,简称CCVS)。CCVS依托“调研家”专业问卷调查平台,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

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区域分布等信息设计分层配额抽样方案,从“调研家”自运营的遍布全国各省份的 100 万活跃会员中抽取样本。调查的目标对象为 18 岁及以上成年人,设计调查样本为 3 000 人。调查过程中,项目组根据预先设置的检测程序和智能验证系统对调查质量严格把关,最终回收的有效问卷共 2 997 份。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 18~49 岁的受访者,共计 1 817 人。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项目组对调查结果计算了事后抽样权重,以平衡配额抽样的可能偏差。加权后调查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布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相应年龄段的相关信息较为接近(胡安宁,2025)。本文在分析过程中统一使用加权样本。

(二) 实验设计与变量测量

本文利用多因素调查实验设计收集数据,检验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孩生育态度”,使用如下题项收集信息,“假设张女士已婚且婚姻稳定,目前有且只有一个孩子。如果生育二胎,张女士能享受【随机选项1】、【随机选项2】以及【随机选项3】。您觉得她应该生育二胎吗?”变量的初始选项包括:1= 非常不应该;2= 不应该;3= 说不上应该不应该;4= 应该;5= 非常应该。本文使用受访者在虚拟情境下符合自身认知态度的选项,代理测量其在不同(假想)生育支持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生育意愿或生育倾向不同,本文测量的二孩生育态度是受访者在特定生育支持情境下对虚拟第三方是否应生育二孩的价值判断,本质上属于基于陈述性偏好测量方法的“情境化生育态度”,也称“归因生育意愿”(ascribed fertility desire)(Guetto 等,2025)。以往研究表明,受访者在评判虚拟第三方是否应该生育时,会不自觉地投射自身在相同情境下的生育态度(Karabchuk 等,2021),因而这种评判过程能有效反映其本人在对应情境中的二孩生育潜力(於嘉等,2023)。另外,通过虚拟第三方视角构建的“情境化态度”测量框架有助于弱化宏观社会环境对个人回答行为的直接影响,避免受访者使用“模糊化”或符合社会认知的回答方式掩盖自身想法,从而有效降低社会期望偏差(Gong 等,2022;Schachter 等,2024),更好地捕捉受访者在特定生育支持情境下关于二孩生育决策的真实态度(Guetto 等,2025)。通过对比受访者在不同虚拟情境下的选择,能够从侧面反映其对不同生育支持措施的偏好。

本文的自变量是生育支持措施及其组合。上文介绍的实验题项中,【随机选项1】、【随机选项2】、【随机选项3】分别代表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照料支持的具体情境,三者共同构成调查实验的生育支持组合情境。本文使用的调查实验中,经济支持与时间支持分别设置 2 个可选情境,照料支持设置 3 个可选情境;表 1 汇报了这些情境的具体设置。如表 1 所示,上述情境的所有可能组合共计 12(=2*2*3)种,代表 12 种不同的生育支持组合。在调查实验实施过程中,针对每一位受访者,使用不放回的随机抽样方式抽



取 3 种不同的组合,也即,调查过程对所有受访者依次收集了 3 种不同组合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①。

表 1 调查实验中的随机选项设置

	【随机选项 1】(经济支持)	【随机选项 2】(时间支持)	【随机选项 3】(照料支持)
	每月获得 100 元额外津贴	6 个月带薪产假	自己照料
取值	每月获得 1000 元额外津贴	12 个月带薪产假	配偶、父母 / 公婆提供预期照料支持 家附近有公办且实惠的托育机构

结合上文介绍的数据特征和既有文献关于生育政策响应群体差异的实证发现 (Karabchuk 等, 2021; 於嘉等, 2023), 本文在模型构建中系统控制了可能影响受访者对生育支持措施感知的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特征及现有子女信息, 以消除群体异质性带来的混杂效应。具体而言,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婚姻状态、年收入(对数)、户口类型、已有子女数量、已有子女性别结构等。表 2 汇报了这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在不同支持组合的虚拟情境下, 受访者二孩生育态度的样本均值为 3.357, 整体偏向于认为应该生育二孩。经济支持、时间支持、照料支持变量的样本均值均接近随机分配的期望值, 印证了实验设计中各情境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817)

变 量	说明	均值(标准差)
二孩生育态度	取值范围 1~5; 数值越大, 二孩生育态度越积极	3.357(1.139)
提升经济支持	额外津贴; 1=1000 元 / 月, 0=100 元 / 月	0.506
提升时间支持	带薪产假; 1=12 个月, 0=6 个月	0.500
自己照料	1= 自己照料, 0= 家庭 / 机构照料	0.333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	1= 家庭照料支持, 0= 无家庭照料支持	0.332
给予机构照料支持	1= 机构照料支持, 0= 无机构照料支持	0.335
女性	1= 女性, 0= 男性	0.553
年龄	受访者的周岁年龄	33.699(8.965)
农村户口	1= 农村户口, 0= 城镇户口	0.516
汉族	1= 汉族, 0= 其他民族	0.943
未婚	1= 未婚, 0= 其他	0.312
已婚	1= 已婚, 0= 其他	0.639
离异或丧偶	1= 离异或丧偶, 0= 其他	0.049
大专及以上	1= 大专及以上; 0= 其他	0.444
年收入	个人年收入(元), 取自然对数	10.70(2.103)
已有子女数	受访者现有的子女数量(个)	0.892(0.807)
是否有儿子	1= 是, 0= 否	0.452

分配的随机性。此外, 样本中女性受访者占 55.3%, 受访者的年龄均值约 33.7 岁, 农村户籍受访者占 51.6%。

(三)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定性比较分析法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简称 QCA) 探究生育支持措施及其组合对个人二

① 有效调查样本中有 1 位受访者仅回答了 1 种组合情境, 故后续模型中的样本量为 5 449。

孩生育态度的影响。由于每位受访者在调查过程中提供了 3 种实验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实验情境调查结果与受访者构成嵌套关系,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在考虑上述群组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各类支持措施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同时,考虑因变量为定序测量,本文利用定序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并使用线性固定效应模型对结果进行交叉检验。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模糊集(fuzzy-set)QCA 方法探讨生育支持措施组合与二孩生育态度之间的复杂因果关联。以往的政策评估研究大多利用在回归模型中添加交互项的方式探究各类支持措施的协同效应,这些做法隐含了不同支持措施实施与否相互独立的假设。然而,在给定的预算约束下,不同支持措施的实施可能存在替代关系(于萌,2023; Guetto 等,2025)。基于 QCA 方法的组态分析并不要求各类支持措施相互独立,且能够突破因果对称假设,有助于识别“多因并发”型复杂因果关联(Ragin,2008;许琪,2024)。因此,本文选用模糊集 QCA 方法识别生育支持措施组合的影响,分析二孩生育态度在生育支持情境中的接受域。

QCA 方法的求解以逻辑学和集合论为基础。本文关注的虚拟情境中的生育支持措施构成实验组集合和控制组集合,前者表示生育支持变量取值为 1 的样本集合,元素有 A (每月获得 1000 元额外津贴)、 B (12 个月带薪产假)、 C_1 (配偶、父母/公婆提供预期照料支持)、 C_2 (家附近有公办且实惠的托育机构);后者表示生育支持变量取值为 0 的样本集合,元素有 \bar{A} (每月获得 100 元额外津贴)、 \bar{B} (6 个月带薪产假)、 \bar{C}_1 (未给予家庭照料支持)、 \bar{C}_2 (未给予机构照料支持)。其中, C_1 和 C_2 均由表 1 中“随机选项 3”测量而得,按照实验设计二者之间呈互斥关系(即不能同时出现)。因此,这些集合的组合对应 12 种生育支持情境。例如,集合 $\bar{A}\bar{B}C_1\bar{C}_2$ 对应“每月获得 1000 元额外津贴、6 个月带薪产假、配偶或父母提供预期照料支持”实验情境。与常规计量模型不同,QCA 分析不估算各变量的回归系数,而是基于布尔逻辑来研究多个预测因素的各种可能组合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一致性指数(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是 QCA 分析中两个常用的估计指标,二者的取值范围均是 0~1 之间。其中,一致性指数反映预测因素作为必要条件的符合程度,取值越接近 1,说明生育支持组合情境越符合必要条件;覆盖率则是判断预测因素重要性的指标,取值越接近 1,表明相应生育支持组合情境对二孩生育态度变化的解释力越强。

四、研究发现

(一) 不同类型支持措施的影响

表 3 汇报了定序固定效应模型和线性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 M1 和 M2 的结果均显示,经济支持、时间支持与照料支持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各类生育支持均有助于正向激励二孩生育态度。由此可见,当前公众对二孩生育的态度与生

表 3 生育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

	定序模型 M1		线性模型 M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提升经济支持	0.879***	(0.082)	0.266***	(0.025)
提升时间支持	0.430***	(0.075)	0.123***	(0.022)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	0.978***	(0.098)	0.299***	(0.029)
给予机构照料支持	0.646***	(0.098)	0.200***	(0.030)
女性	-0.477**	(0.174)	-0.133**	(0.049)
年龄	-0.011	(0.014)	-0.003	(0.004)
农村户口	0.267	(0.177)	0.083	(0.050)
汉族	0.029	(0.389)	0.012	(0.108)
已婚	0.423	(0.313)	0.119	(0.089)
离异或丧偶	0.543	(0.486)	0.133	(0.132)
大专及以上	-0.122	(0.203)	-0.020	(0.058)
年收入(log)	0.131**	(0.045)	0.040**	(0.013)
已有子女数	0.626***	(0.178)	0.181***	(0.049)
是否有儿子	0.476*	(0.231)	0.142*	(0.065)
切点 1	-2.276**	(0.735)		
切点 2	0.004	(0.730)		
切点 3	3.674***	(0.736)		
切点 4	6.334***	(0.750)		
常数项			2.393***	(0.203)
个案数	1817		1817	
实验样本量	5449		5449	

注:*,**、*** 分别表示 $p<0.1$ 、 $p<0.05$ 、 $p<0.01$ 、 $p<0.001$;若无特殊说明,下表同。

影响方面,配偶的育儿支持比父母/公婆的支持作用更大(张晓倩、宋健,2024)。由此不难理解,本文在考虑配偶的育儿支持后,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效应比机构照料支持更大。这也表明,推动男性参与育儿,有助于释放二孩生育潜力。

(二) 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

1. 单一支持措施的必要性分析

针对自变量进行单一必要条件分析,是 QCA 组态分析的基础^②。表 4 报告了各单一生育支持措施预测二孩生育态度时的一致性指数和覆盖率。由表 4 的分析结果可知,提

育、养育相关的资源约束有关,能够缓解相应约束的各类支持均能对个人的二孩生育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相对于无照料支持的情形,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大于机构照料支持的影响,统计检验结果显示这一差异显著^①。这一发现与於嘉等(2023)的研究结论不太吻合。於嘉等(2023)研究发现,低价公立育儿机构支持对个人二孩生育态度的正向影响大于家庭照料支持。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本文的家庭照料支持包含了配偶的育儿支持,区别于於嘉等(2023)研究中以父母和公婆提供的照料帮助作为家庭支持的测量指标。以往研究发现,在缓解女性工作一家庭冲突对二孩生育意愿的负面

① 在定序模型中,直接比较系数大小可能存在边际效应不恒定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计算了相应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在因变量的各类别中,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边际效应均大于机构照料支持的边际效应,显著性检验对应的 p 值为 0.0013。
② 单一必要条件是指所有目标结果案例中都存在的条件,即该条件发生是结果发生的必要前提。根据 Ragin(2008)的分析,一般以一致性指数大于 0.9 作为判定单一必要条件的经验标准。

升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给予照料支持的一致性指数均小于 0.9。这表明,就本文调查实验中设计的具体支持措施来看,任何单一的支持措施均不构成提升二孩生育积极性的必要条件。

表 4 单个生育支持措施的必要性分析

	一致性	覆盖率
A:提升经济支持	0.524	0.528
B:提升时间支持	0.513	0.512
C ₁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	0.350	0.353
C ₂ :给予机构照料支持	0.323	0.326

对于非单一必要条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其组合效应。表 4 中覆盖率分析结果显示,在本文考察的各项支持措施中,提升经济支持的覆盖率最大,表明经济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解释力相对更高;给予家庭照料支持和机构照料支持的覆盖率较为接近。可见,家庭照料支持是改善二孩生育态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建立婴幼儿照料支持体系时,提高家庭支持有望成为公共服务支持的有益补充。

2. 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

表 5 汇报了更为符合二孩生育态度必要性条件要求的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即一致性得分显著高于其余组合均值的优势组合。可以发现,首先,更高的经济支持是所有优势组合的共性特征。经济支持能有效缓解育龄人群的经济压力,提升个人的生育意愿、降低“不想生”的概率(石智雷等,2024)。其次,家庭照料支持对个人二孩生育态度的正向影响大于机构照料支持。比较组合 1 和组合 2 的一致性指数及覆盖率,可以发现,提升经济支持与给予家庭照料支持组合的一致性指数与覆盖率均大于提升经济支持与给予机构照料支持组合;比较组合 3 和组合 4,也能得到类似的结论。

总模型的一致性是指所有条件组合与结果的一致性,值越接近于 1,代表生育支持组合与二孩生育态度之间的关系越稳定^①。表 5 显示,所有生育支持措施组合解的一致

表 5 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分析

	组合 1($A\bar{B}\bar{C}_1C_2$)	组合 2($A\bar{B}C_1\bar{C}_2$)	组合 3(ABC_1C_2)	组合 4($ABC_1\bar{C}_2$)
提升经济支持(A)	●	●	●	●
提升时间支持(B)	○	○	●	●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C ₁)	○	●	○	●
给予机构照料支持(C ₂)	●	○	●	○
一致性得分	0.570*	0.585***	0.581**	0.613***
唯一覆盖率	0.087	0.093	0.087	0.097
总模型的一致性	0.596			
总模型的覆盖率	0.364			

注:●表示提升或给予相应支持条件(对应维度的支持措施取值为 1),○表示未提升或给予相应支持条件(对应维度的支持措施取值为 0)。

① 解的覆盖率则体现生育支持组合对二孩生育态度的解释力。在判定充分必要条件时,主要依据一致性得分指标(Ragin, 2008)。

性得分为 0.596。这表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照料支持不构成解释二孩生育态度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致性得分大于 0.8)(Ragin,2008)。现阶段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常见的单一或少数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可能并不足以完全预测或解释相应态度。尽管本文所探讨的生育支持措施能够促进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变化,但其作用效果还需要其他配套条件。为检验影响生育支持措施发挥作用的条件,本文结合微观经济学关于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的论断,在模型中加入教育、收入、性别和户籍类型。表 6 展示了加入上述变量后一致性得分大于 0.8 的优势组合。

表 6 的结果表明,首先,与前述分析结果一致,在考虑受访者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后,提升经济支持依然是所有一致性得分高于 0.8 的优势组合的共性条件。其次,农村户籍、低学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在生育支持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更积极。表 6 中一致性得分大于 0.8 的 10 个优势组合中,有 9 个组合包含农村户籍特征(H 集合),9 个组合包含较高收入特征(I 集合),7 个组合包含高中及以下学历这一条件(\bar{E} 集合)。由于农村户籍人口的生育意愿原本就相对较高(石智雷等,2022),生育支持措施对其二孩生育态度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再次,比较表 6 中组合 1 和组合 5 以及组合 2 和组合 4 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可比的情况下,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大于机构照料支持。表 6 的分析结果表明,控制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的干扰后,来自家庭成员(配偶或父母)的照料支持依然是公共政策支持的重要补充。

3. 异质性分析

表 6 考虑个人特征后的优势条件组合

序号	组合	一致性得分
1	$ABC_1\bar{C}_2\bar{E}\bar{F}HI$	0.843
2	$ABC_1\bar{C}_2\bar{E}FHI$	0.842
3	$ABC_1\bar{C}_2\bar{E}\bar{F}\bar{H}I$	0.827
4	$ABC_1C_2\bar{E}\bar{F}HI$	0.826
5	$ABC_1C_2\bar{E}\bar{F}HI$	0.815
6	$ABC_1C_2\bar{E}\bar{F}HI$	0.808
7	$ABC_1C_2\bar{E}\bar{F}HI$	0.826
8	$ABC_1C_2\bar{E}\bar{F}HI$	0.809
9	$ABC_1C_2\bar{E}\bar{F}\bar{H}\bar{I}$	0.808
10	$ABC_1C_2\bar{E}\bar{F}HI$	0.805

注: E 、 F 、 I 、 H 分别表示个人受教育程度、性别、年收入、户籍变量取值较高的模糊集集合, \bar{E} 、 \bar{F} 、 \bar{I} 、 \bar{H} 分别为对应的补集。这些集合的具体转换方式与转换原理,可参见 Longest 等(2008)。

上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在不同生育支持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因其学历、户籍等特征而异(如表 6 所示)。由于模糊集 QCA 分析中前因条件变量增多将导致组合数量大幅增加,在有限样本约束下,部分组合可能成为空集(没有符合条件的样本)或样本量过少,从而导致模型过拟合或分析结论出现偏差。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调查实验数据,生育支持情境在不同特征群体间是随机分配的。本文利用子样本分析的方式进一步识别生育支持组合对不同特征群体的差异性影响,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在性别差异方面,整体来看,生育支持对男性二孩生育态度的正向影响大于女性,但不同支持措施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表 7 显示,就单一支持措施的影响来看,家庭照料支持对男性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对女性而言,家

表 7 生育支持措施组合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组 态	性别差异			城乡差异			教育差异		
	男性	女性		农村	城镇		大专及以上	高中及以下	
参照情境									
$\overline{ABC_1C_2}$	0.520	0.411	***	0.481	0.457		0.372	0.484	***
给予或提升一种支持									
$\overline{ABC_1C_2}$	0.536	0.470	*	0.516	0.497		0.461	0.515	*
$\overline{ABC_1C_2}$	0.539	0.459	**	0.519	0.494		0.446	0.512	*
$\overline{ABC_1C_2}$	0.569	0.491	**	0.581	0.501	**	0.479	0.540	*
$\overline{ABC_1C_2}$	0.513	0.492		0.536	0.481	*	0.436	0.516	**
给予或提升两种支持									
$\overline{ABC_1C_2}$	0.596	0.518	**	0.540	0.564		0.508	0.565	+
$\overline{ABC_1C_2}$	0.558	0.504	+	0.547	0.521		0.485	0.540	+
$\overline{ABC_1C_2}$	0.552	0.492	*	0.525	0.522		0.463	0.535	*
$\overline{ABC_1C_2}$	0.579	0.592		0.593	0.580		0.586	0.585	
$\overline{ABC_1C_2}$	0.597	0.543	+	0.576	0.566		0.536	0.578	
给予或提升三种支持									
$\overline{ABC_1C_2}$	0.635	0.590	+	0.622	0.608		0.586	0.619	
$\overline{ABC_1C_2}$	0.608	0.552	+	0.590	0.576		0.582	0.581	

注：表中数值为一致性得分。

庭照料支持和机构照料支持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从两种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来看,经济支持和机构照料支持组合对男性的二孩生育态度促进效应更强,女性则受经济支持与家庭照料支持组合的影响更为明显。综合单一支持和两种支持情境下的性别差异,可以推断,在经济支持较高的情境下,男性的二孩生育态度会随机构照料支持的可得性而明显变化;但在经济支持较弱的情境下,有无家庭照料支持对男性二孩生育态度影响更大。与之相对,女性在较高的经济支持情境下,更有可能因家庭照料支持而强化二孩生育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样本中,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大于同时有 3 种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可见,将带薪产假从 6 个月延长到 12 个月没有在女性群体中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甚至可能弱化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在女性群体中的正向影响,对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产生负向协同效应。究其原因,由于男性育儿假在中国普及率较低(王向贤、司艺旋,2023),延长产假可能损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与晋升机会(石智雷、王璋,2024),加剧女性的职业担忧,从而导致在拥有其他支持的情境下,延长产假未能对女性的二孩生育态度产生正向边际效应。

在城乡差异方面,农村户籍人口二孩生育态度受生育支持措施的影响大于城镇户籍人口。具体来说,在单一支持措施的情境下,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户籍受访者,其二孩生育态度受家庭照料支持的正向影响最大。在有两种支持措施组合的情境下,经济支持

和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最大。值得注意的是,表 7 的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与延长产假支持组合的效应在城镇样本中相对更大。这可能是由于产假措施的受益对象主要是有工作的女性,一般来说,农村户籍人口中有非农工作的比例相对更低、从延长产假政策中受益的可能性相对更低,因此,延长产假的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户籍人口中。在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照料支持的组合情境中,家庭照料支持的边际效应大于机构照料支持。这可能与当前家庭对托育机构服务的安全性、机构资质等方面的顾虑有关(高琛卓等,2020),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家庭照料是育龄夫妻的首要选择。

在教育差异方面,生育支持对中低学历(高中及以下)群体二孩生育态度的积极效应显著大于高学历(大专及以上)群体。在单一支持措施的情境下,无论是高学历群体还是中低学历群体,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最大;在两种支持措施组合的情境下,经济支持与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最大。这些结果与性别、城乡异质性分析的结论相吻合,侧面印证了结论的稳健性。此外,在高学历群体中,延长产假并不产生积极的边际效应,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与仅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无显著差异。

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两种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调查实验设计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取决于实验情境的分配是否满足随机性条件,对此,本文检验各支持措施组合情境下有效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差异。将实验情境分组(共 12 组)对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户籍、民族、婚姻状态、教育、收入及现有子女数量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印证了实验情境分配的随机性。其次,本文使用的调查实验中,每位受访者均回答了 3 个不同支持情境下的二孩生育态度;为检验 3 个情景的填答次序可能带来的偏差,本文从每位受访者填答的 3 个支持情境中随机抽取 1 个填答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8),在对生育支持情境数据进行随机抽

表 8 生育支持措施组合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组合 1($\overline{A}\overline{B}\overline{C}C_2$)	组合 2($\overline{A}\overline{B}C_1\overline{C}_2$)	组合 3($\overline{A}B\overline{C}_1C_2$)	组合 4($\overline{A}B\overline{C}_1\overline{C}_2$)
提升经济支持(A)	●	●	●	●
提升时间支持(B)	○	○	●	●
给予家庭照料支持(C_1)	○	●	○	●
给予机构照料支持(C_2)	●	○	●	○
一致性得分	0.540 ⁺	0.578 [*]	0.577 [*]	0.589 ^{**}
唯一覆盖率	0.081	0.092	0.086	0.099
总模型的一致性	0.592			
总模型的覆盖率	0.423			

注:同表 5。

样后,影响二孩生育态度的主要优势组合与前文(参见表5)分析结果一致,各组合解释力的相对顺序也无明显变化。这些结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厘清生育支持措施组合对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线上调查实验数据,通过设置生育支持组合实验情境,分析了经济支持、时间支持与照料支持组合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就本文考察的生育支持措施的具体情境而言,单一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照料支持均有助于激发积极的二孩生育态度,但不同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对二孩生育态度的影响可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协同效应。具体而言,首先,较高的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组合会产生正向协同效应,二者通过缓解生育相关的经济压力和育儿照料顾虑,有利于提升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积极性。其次,延长带薪产假的时间支持与经济支持、照料支持相组合,可能对二孩生育态度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在女性、高学历群体中,上述3种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低于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支持的组合效应。再次,由家庭成员(配偶或父辈)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是提升育龄人群二孩生育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与机构照料支持相比,家庭照料支持对二孩生育态度的正向影响更大。本文异质性分析也表明,由配偶或父辈提供的家庭照料支持对女性、高学历群体等生育意愿较低者的生育态度提升作用更强。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如下启示意义。

第一,提供经济支持有助于激发积极的二孩生育态度。本文分析结果表明,在对二孩生育态度具有较强预测力的生育支持组合中,其共性条件之一是提升经济支持。经济约束是影响多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育儿补贴能降低经济成本对个人生育决策的限制,提升女性生育意愿(黄乾、范子昂,2023)。不过,考虑到西方经验表明发放育儿补贴可能对公共财政带来较大压力(Gauthier,2007),经济支持措施的设计和实施需要重视公共财政的负担能力和政策体系的可持续性。

第二,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仅需要关注各项生育支持措施的独立效应,还应当重视不同支持措施间协同效应的性质。例如,尽管延长带薪产假对二孩生育态度具有积极效应,但由于相应措施可能损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从而抵消其他生育支持措施(如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的正向影响。为此,政策设计需要避免不同支持措施之间的负向损耗,通过优化公共政策资源的布局,发挥不同支持措施间的正向协同效应,更好地实现人口长期高质量发展。

第三,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重视发挥家庭支持对公共政策支持补充作用。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来自家庭成员

的支持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张晓倩、宋健,2024);尤其是来自配偶的育儿支持,比父辈的育儿支持更有助于缓解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积极性(张晓倩、宋健,2024)。因此,营造积极的家庭照料支持氛围、推进夫妻共同育儿,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完善的方向,也有助于推进性别平等发展。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使用受访者对虚拟情境中第三方是否应生育二孩的判断来衡量个人的二孩生育态度,这一测量虽然反映了个人对二孩生育的主观态度(Karabchuk等,2021;於嘉等,2023),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潜在的社会期望偏差,但是这种主观态度最终是否会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还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探讨。其次,本文的数据来自线上调查,尽管当前育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为互联网使用者,但调查和研究未将网民群体考虑在内,结论的一般有效性还有待检验。再次,调查实验虽然为探讨生育支持措施的组合效应提供了便利,但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完全模拟真实政策情境。例如,文章虽然探讨了经济支持的正向影响,却无法精确预估每投入一定单位的生育津贴支持所能带来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后,生育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本文关注的支持措施外,影响个人二孩生育态度的支持措施可能还有很多。受限于实验设计与调查样本量,本文仅考虑了较为常用的经济支持、时间支持与照料支持。在未来数据资料允许的情况下,关于生育支持组合效应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有待进一步丰富。

参考文献:

1. 高琛卓等(2020):《城市父母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1期。
2. 胡安宁(2025):《何以为“孝”:从行动者角度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孝道评判》,《社会科学》,第4期。
3. 黄乾、范子昂(2023):《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女性生育意愿吗?——基于企业—员工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4. 茅倬彦等(2021):《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评估及启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2期。
5. 石智雷等(2022):《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人口学刊》,第3期。
6. 石智雷等(2024):《生育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与托底效应——来自生育补贴政策田野实验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7. 石智雷、王璋(2024):《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社会》,第2期。
8. 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人口研究》,第4期。
9. 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3):《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欧洲实践与中国思考》,《西北人口》,第3期。
10. 王向贤、司艺旋(2023):《如何推动父亲参与育儿?——日韩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11. 王玥等(2023):《女性就业视角下 OECD 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人口学刊》,第 6 期。
12. 王卓、李梦鹤(2024):《生育支持政策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 2021 年成都市专项调查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 4 期。
13. 许琪(2024):《探索择偶偏好中的因果复杂性——使用 QCA 对调查实验数据的再分析》,《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14. 杨菊华(2019):《生育支持与生育支持政策:基本意涵与未来取向》,《山东社会科学》,第 10 期。
15. 於嘉等(2023):《中国育龄人群生育潜力影响因素的随机实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 2 期。
16. 于萌(202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基于政策工具与目标匹配的视角》,《浙江学刊》,第 1 期。
17. 张晓倩、宋健(2024):《工作—家庭冲突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家庭育儿支持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第 3 期。
18. 张洋等(2024):《生育支持型家庭政策的国际实践及其微观生育效应——基于国际文献的元分析发现》,《中国人口科学》,第 5 期。
19. 张洋、李灵春(2023):《生育支持政策何以有效:性别平等视角下的 27 国生育支持政策组合与生育率反弹》,《人口研究》,第 4 期。
20. 朱荟、陆杰华(2021):《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社会》,第 3 期。
21. 庄亚儿等(2021):《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2017 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人口研究》,第 1 期。
22. Bergsvik J., Fauske A., Hart R.K. (2021), Can Policies Stall the Fertility Fal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Quasi-)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7(4):913–964.
23. Billingsley S., Ferrarini T. (2014), Family Polic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21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6(2):428–445.
24. Dittmer T. (2005),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in Economics Textbook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36(4):391–399.
25. Duvander A.Z., Lappegård T., Andersen S.N. et al. (2019),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and Continued Childbearing in Iceland, Norway, and Sweden. *Demographic Research*. 40:1501–1528.
26. Gauthier A.H. (2007),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6:323–346.
27. Gauthier A.H., Gietel-Basten S. (2025), Family Policies in Low Fertility Countries: Evidence and Reflec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51(1):125–161.
28. Gong S., Wang S. (2022), Family Policy Awareness and Marital Intentions: A National Survey Experimental Study. *Demography*. 59(1):247–266.
29. Guetto R., Alderotti G., Vignoli D. (2025), Can Family Policies Enhance Fertility? An Ex Ante Evaluation Through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 *Demography*. 62(1):311–334.
30. Hart R.K., Bergsvik J., Fauske A. et al. (2024), Causal Analysis of Policy Effects on Fertility. In Zimmermann, K.F. (eds), *Handbook of Labor, Human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Springer, Cham.
31. Karabchuk T., Dülmer H., Gatskova K. (2022), Fertility Attitudes of Highly Educated Youth: A Factorial Surve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84(1):32–52.
32. Longest K.C., Vaisey S. (2008), Fuzzy: A Program for Perform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es (QCA) in

- Stata. *The Stata Journal*. 8(1):79–104.
33. Luci-Greulich A., Thévenon O. (2013),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387–416.
 34. Ortiz I. (2015), Social Protection for Children: Key Policy Trends and Statistics. *Social Protection Policy Paper*. 14.
 35. Ragin C.C. (2008),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212.
 36. Schachter A., Weisshaar K. (2024). Survey Experiments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1.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083024-070113>.
 37. Thévenon O.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57–87.
 38. Thomas J., Rowe F., Williamson P. et al. (2022), The Effect of Leave Policies on Increasing Fertility: A Systematic Revie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9(1):1–16.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Support Mix on the Attitude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An Analysis Based on Online Survey Experiment Data

Chen Tao Hu Anning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fertility policy system and build a fertility-friendly society, it is crucial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support mix on attitudes toward having a second child. Using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survey experimental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ertility support mix on the attitude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dividually, economic support, time support, and caregiving support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econd-child fertility attitudes. However, the support mixes produce varying synergy effects,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Specifically, a combination of economic support and caregiving support generates positive synergistic effects, amplifying the promotion effects on the attitude towards second-child birth. Conversely, extending maternity leave undermin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creased economic and caregiving support on the attitude toward second-child birth among women and highly educated individuals, creating a negative synergistic effect. Furthermore, caregiving support from spouses or parents has a stronger positive influence on attitudes toward a second child birth compared to institutional caregiving suppor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synergies among various supports and the critical role of family support in refining the fertility support system.

Keywords: Fertility Support; Policy Mix; Synergistic Effect; Survey Experiment

(责任编辑:牛建林)